



朱國光

经济论著全集



第
5
卷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劉國光

經濟論著全集



(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轉型過渡時期的探索 1983—1985 年) 第 5 卷



知識產權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劉國光

目 录

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

(1983年8月) 1

孙冶方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几个问题

(1983年8月) 13

再论买方市场

(1983年9月) 38

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

(1983年年末至1984年年初) 58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1984年1月) 85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问题

(1984年1月) 128

对“七五”计划指导思想的几点意见

——在物价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 (1984年2月11日) 148

要处理好几件大事的关系

——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1984年2月16日) 154

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在美国华盛顿世界银行经济研究所的讲演稿 （1984年3月） 164

关于经济体制的模式问题

——在国家体改委举办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的讲课 （1984年5月3日） 180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的总体设想

（1984年8月20日） 211

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

——学习《邓小平文选》关于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论述 （1984年10月） 243

研究社会主义流通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4年10月12日） 254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座谈发言摘要

（1984年11月8日） 261

改造经济体制模式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1984年12月） 263

云南、贵州两省经济计划工作几个问题的调查

（1985年1月15日） 283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应有良好的经济环境

——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1985年2月） 293

城市工商业体制改革的实践

（1985年2月） 299

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

（1985年4月） 311

关于深圳特区的发展战略问题

——在深圳市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1985年4月23日) 334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胆创新

——评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稿》 (1985年4月29日) 354

深圳特区的发展战略目标

(1985年8月5日) 358

深圳特区发展面临新的战略阶段

(1985年8月12日) 364

略论两种模式转换

(1985年8月26日) 371

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和 经济发展战略*

(1983年8月)

党的十二大文献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我体会是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提法是对我国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它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民族等条件，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不一样。如果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考虑中国的特点，而是照搬照抄别国模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是不能成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领域。从经济上说，内容也很丰富，概括起来，可否分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两个方面。我们要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制定和实行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前者是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后者与经济调整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经济调整的深远意义，就在于通过它来走出一条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即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有的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的出发点。我很赞成这种看法。之所以说是出发点，是因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三十多年，并不都是

* 本文系198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一书的后记。

照抄外国的东西。无论在经济体制方面，还是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我们过去都有许多不同于别国的、属于我们自己独有的或者发展了的特点。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经验。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左”倾错误的产物，它妨碍了当时我国经济的发展，使之未能取得应有的更大的成就。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彻底排除各种错误的影响，进一步地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几年来我国的经济调整与经济改革，正是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朝着我们的奋斗目标前进的。

我们要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还没有一种现成的完备的形态，还要我们通过建设实践来摸索。特别是在具体的细节上，中国的特色将采取什么样的表现形态，如果没有实践的摸索，那是不可能预见清楚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作为奋斗目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能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在总结中外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勾画出一个轮廓来呢？我想是能够而且应当这样做的。如果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那我们怎么能够有前进的方向呢？当然，这个轮廓要随着实践和经验的积累，逐步地加以具体化，逐步地形成一整套完备的形态。

就经济体制的改革来说，勾画出一个奋斗目标的轮廓，这同本书讲的探索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是有关的。有的同志不大赞成“模式”的概念，好像“模式”是指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语词。其实“模式”这个语词，就像“类型”“形态”等语词一样，它本身是中性的，既无贬义，也无褒义，它不过是一种研究和分析的工具。某种经济体制的模式并不直接等于该种体制本身，而是从具体的体制中排除了细节的东西而得到的



理论的抽象。这种理论抽象包含对某种经济体制的基本规定性的概括，它的基本框架，以及它的主要运行原则的总和。这种意义的经济模式反映了一种经济体制里面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所以，在设计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和具体方案以前，对于改革的目标模式先行一步研究是很有用处的。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防止在一开始就陷入细节从而受到各种次要因素的干扰而看不到主要的东西，又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经济体制，便于使改革的各项措施配套成龙，前后有序，而不致互相矛盾。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时，不可避免地要同世界上各种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这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我们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究竟表现在哪里，而且也有利于我们从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取长补短，避免再走弯路。

提出经济模式的概念，把它同经济体制里面的具体细节区别开来，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我的理解，不仅仅是指对原有体制（在我国，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体制）里面的不完善不合理的细节进行修改补充，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原有的经济模式本身，就是说，要对原有体制的不合理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运行原则加以改造。当然，这种改造一定要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等）的前提下进行。在我国，一定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对原有的经济模式不加触动，只是对里面的具体细节进行一些修改补充，这恐怕不能叫作改革，在我们这里是叫作“改进”经济体制或者“完善”计划工作；有的国家叫作“完善经营机制”。对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具体环节，对于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具体环节，总是要不断地完善，不断地改进，这种完善和改进的工作永远是有的。而对于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即模式的改造，则一般是要在一个比较集中的、不太长的时期里进行和完成的。

对于“改革”与“完善”这两个概念的差别，人们实际上是很注意的。据我们所知，有的国家，起先也讲改革，20世纪60年代中期讲改革时也似乎有总想冲破老模式、老框框的气概，但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很快就把改革的口号收回去了，代之以“不断完善”。这样，在对原有模式没有多大触动的情况下，尽管对经济体制的一些破绽不断修补，但是他们经济生活中的活力问题、质量问题、效率问题、产需衔接问题等原有模式的老毛病，老是解决不了，现在不得不又重提“改革”的问题。我国前些时候也有的同志曾经回避讲改革，而只提改进或完善经济计划体制，其实质就是要在不触动原有模式的前提下，对经济体制的一些不合理、不完善的具体环节进行修改补充。这些同志担心一讲改革或改造原有的经济模式，就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否定我们过去工作中好的经验和成绩。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体制已经出现过并且存在着种种不同的模式，这些经济模式都各有自己产生的历史背景，各有其长短优劣，并起了各自的历史作用。而一些国家经济体制模式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性质。对于每种模式我们不能绝对地肯定或者绝对地否定，不能因为后来情况变化需要改革而全盘否定它过去存在的历史价值。例如，我国过去实行的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排斥市场机制的经济模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定时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这种模式的毛病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全面的改造，用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来代替它。当然，这并不是要把原有体制中的一切东西都抛弃掉换成新的。原有经济体制中被实践证明是好的、有益的因素，我们还是应当在新体制中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当前要进行的体制改革和模式改造就否定原有模式



在我国过去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更不用说这丝毫也不是对过去体制中好的有益的东西和我们过去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的否定了。

这样看来，经济模式的理论研究和有中国特色的目标模式的探索，对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来说，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充分的研究和探索就直接规划改革的方案，或直接着手进行重大的改革，那就可能会使改革的质量和进程受到影响。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等到目标模式研究完备了、总体规划和详细的方案都拟好了，才能进行改革。一些局部性的、目前有条件改的，可以看清楚不会对将来的全面改革带来重大障碍的而是符合全面改革方向的，现在就应当尽快地改，或者先在小范围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为大规模的全面改革创造条件。对于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和形成来说，局部改革试点的经验和实践的检验，也是非常必要的。任何经济模式的研究和目标模式的探索，涉及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这里不去一一列举了。其中有些在本书中已经提到，有些还没有接触到；已经提到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国经济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以适应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经济体制的需要。

在制定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党的十二大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在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中，提出了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等一系列战略设想。这些战略设想，全面肯定并基本上完成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也吸收了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讨论的成果。对于这个战略转变的含义和内容，我国经济学界已经有了不少的论述，本书有关文章也有所涉及。这里我想补充谈谈经济学界关于这一战略转变的一种看法。

这种看法，把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同一些发

展中国家若干年来发展战略的转变进行类比，认为中国这几年发生的战略转变就像那些发展中国家一样，是从所谓“传统的发展战略”过渡到所谓“新的发展战略”。这里讲的“传统的发展战略”，是指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和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采取这种战略往往忽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并带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消极现象。这里所讲的“新战略”，是指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重视分配公平、保证生活质量的战略。用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发展战略”向“新的发展战略”的过渡来类比我国发展战略的转变是否妥当？我以为是不尽妥当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将近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不能简单地用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采用的所谓“传统的发展战略”来概括的。因为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过几次重大的变动，有比较正确、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时候，如“一五”时期；也有重大失误的时候，如“大跃进”时期。当战略决策比较正确时，国民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而当战略决策失误时，经济发展就受挫折，人民生活不能改善，社会主义制度也受到削弱。因此，把过去二三十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笼统地用一些发展中国家所谓传统的旧战略来概括，是不怎么确切的。尽管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和实行自己的发展战略时决不能像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把社会的平等和人民的福利置之度外。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尽管一再出现某些消极现象，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经常的失业、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增长的外债负担等“传统的旧战略”所必然带来的弊病，在我国或者是不存在，或者是一种例外。另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所谓“新战略”所要解决的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问题，包括营养、



保健、教育等，在中国过去的发展中已经取得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羡慕的令人瞩目的成果。对于这些，外国许多公正的观察家和评论家都是承认的。他们认为，中国在过去的发展中既能迅速地进行工业化，又能同时解决人民的基本需要。^①

当然，肯定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和发展战略中正确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否认我国经济建设中发生过一些重大挫折；这些挫折，大多与“大跃进”以来的经济发展战略一再出现“左”的偏差是分不开的。这种偏差，主要是经济建设上要求过急，政策上过激。经济建设上的过急，表现为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投资规模过大，超出了我们国力的可能，结果不得不收缩，造成很大损失，耽误了很多时间。政策上的过激，往往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所有这些，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使得经济效益难以上去，人民生活的改善同人民所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战略上的拨乱反正，就是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老一套做法，在进一步认清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应当认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

如前所述，党的十二大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作了全面的肯定，并对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是不是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到此已大功告成，今后只是执行党的十二大规定的战略方针和战略设想就可以了呢？应当看到，正确执行党的十二大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和设想，必须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各个方面作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进行理论上的论

① 见英国剑桥大学阿克特·辛教授：“基本需要还是国际经济新秩序”，载《世界发展》1979年第7卷；世界银行考察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进展》（1982年）等处。

证和制定可行的建议。因此，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设想在反映了几年来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是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的一个巨大的推动。

这个领域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就拿战略目标问题来说，对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2000年的战略目标，我们既要论证它的实现的可能性，又要探索如何实现它的有效途径。将近一年来的讨论，对于实现战略目标的可能性的论述不少，但对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的研究则似嫌不足。在对实现战略目标的可能性的论证方面，往往把注意力放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上面，而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并非翻两番这一个单一的目标，而是包括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目标群。如作为翻两番的前提的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翻两番的内容的主要工农业产量居于世界前列；作为翻两番的结果的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的增强、城乡人民收入的成倍增长，以及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等等。所以，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是一个多层次的目标体系，其中有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有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等等。如何分析这个目标体系的内部层次和各个目标之间的关系，把这个多目标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研究论证，看来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再拿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途径的研究来说，在经济发展的速度、比例、效益问题上，人们通过历史的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孤立地追求产值速度必然会带来破坏比例和牺牲效益的后果，因此必须寻求这三者的最优结合。但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特别是其数量关系究竟如何掌握，我们还只是初步地进入了这个研究领域，距升堂入室还很远。例如，长期以来我们的总产值（包括社会总产品、工农业总产值等）的增长速度，往往快于净产值（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而净产值的增长速度，又往往快于剩余产值（利、税）的增长速度，这种对比趋势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对



于我们的战略目标的实现是很不利的。如何改进这种对比关系的趋势，就涉及了速度、结构、效益之间的并涉及众多因素的极其复杂的质与量的关系。对于这些方面、这些因素的内部联系和变化规律以及到2000年这一段时期如何对它们的变化趋势加以掌握驾驭，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又如，在从不平衡的发展战略转向相对平衡的发展战略中，如何把重点发展的需要与平衡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在以外延为主的发展战略过渡到以内涵为主的发展战略中，又如何把我国人力与自然资源的丰足同资金与技术资源的不足协调起来？与这些综合性问题密切联系的还有许多专门性的领域，如人口控制与劳动就业、资金积累与消费水平、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生产布局与城乡关系、智力开发与资源开发、通货物价与财信平衡、国内流通与对外交流、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等等，都有一系列的战略问题需要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有些在本书中提到了，但很多问题尚未触及。所有这些问题，也都有待于我国经济学界开展研究，使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逐步地完善充实起来，为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设想的实现做出努力。

这几年，由于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实施，由于经济发展战略开始转变，经济形势总的很好，而且一年比一年好。我们在文章中指出，经济调整的成效，主要表现在过去若干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一再出现的“两高两低”开始有了变化：高指标取消了；高积累开始下来了；“低消费”的状况有了改善；与此同时，国民经济中的一些主要比例，包括积累与消费、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也已有所改善，逐渐趋于协调；我国经济已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但是，由于低效率的状况改变不大，以及存在着能源、交通卡脖子等情况，还不能说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完成了从不良循环到良性循环的转化。

以上一段意思，是在1981年年末与1982年年初写的。从那以

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经济在进一步调整与改革中继续稳步发展，农业连续获得丰收，轻、重工业全面上升，商品供应日益充裕，市场情况之好是二十多年来所没有过的，人民生活继续改善。但是，在大好形势中不能不看到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值得注意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一是片面追求产值的增长速度，忽视经济效益的倾向有所抬头，工农业总产值上去了，但成本、费用增大，工业增产不增收，经济效益差的状况基本没有多大改变。二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急剧膨胀，特别是预算外投资控制不住，超过了财力、物力可能承担的限度。三是投资规模扩大的结果，造成重工业迅猛回升，致使轻重工业经过调整开始出现协调发展的局面，又有逆转的趋势，还造成能源、交通和工业原料供应全面紧张，开始重新发生建设挤生活、挤市场，重工业挤轻工业，计划外挤计划内，一般项目挤重点项目等现象。四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消费方面，也有失控的苗头，消费基金的增长幅度，持续几年超过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这样长期下去是难以为继的。

上面列举的“新情况”“新问题”，其实并非都是“新”的。经济效益差是几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这要靠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改造才能逐步地彻底地解决。片面追求产值速度，投资规模超过国力，这也是个老问题，前几年的调整中我们注意纠正，有所克服，从而带来了经济形势的好转，但形势一好，就容易头脑发热，旧病复发，1982年以来投资再度猛增及其带来的后果，都是我们过去熟见的，加上消费基金失控这一条——这一条是过去没有的真正的新情况——如果不认真对待，很好解决，我们这几年来好形势就有可能受到折腾，一两年后又得重新来个大调整。

这种潜在的危险在市场情况的变化中得到集中的反映。我曾在本书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买方市场，引起



了不少的争论。现在撇开这些争论不说，我们看到，由于这几年经济调整取得成效，先是在生产资料方面出现了买方市场，采购员满天飞一时间变成推销员满天飞。后来消费品的供应也开始缓和，某些工业消费品陆续出现买方市场。应该认为，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逐渐转化的趋势，是一件大好事。它对于实现消费者的权利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对于促进生产者、供应者之间在改善经营管理、改进生产技术方面开展竞争，对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所必要的一个松动的市场条件，对于改善社会风气、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是大有好处的。但是这几年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逐渐转化的势头是不稳定的、不巩固的。生产资料的买方市场1982年已经缩回去了，再度变为卖方市场；某些工业消费品的买方市场现在也有转回到卖方市场的可能。如果说这几年曾经争得的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的好势头是我们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方针的结果，那么这个势头的不稳定、不巩固则是由于调整得还很不够，还不彻底，通过调整所踏出来的新路子，还不是所有的人都认清了，都坚定地走上去了。1982年以来直到1983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再次急剧扩大，引起重工业迅猛回升，造成了生产资料买方市场的消失，消费资料买方市场的势头也摇摇欲坠，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如果投资规模急剧扩大和重工业迅猛上升的趋势继续下去控制不住，再加上消费基金的增长也控制不住，那么，跟着生产资料买方市场的消失，消费资料的买方市场也将荡然无存，重新回到卖方市场的老路上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什么消费者的权利，什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什么生产者供应者之间的有益的竞争，都将很难谈上；进行经济改革和纠正不正之风，也将增加很大的阻力。

当然，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希望再走老路。过去历史上几次由于投资规模猛增而造成国民经济的折腾，都是事后才发现的，但是已经造成很大损失。这次与过去不同，由于